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 研究文献概览

1950-2011

罗明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11

2000

1990

1980

1970

1960

1950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 研究文献概览

(1950 ~ 2011)

罗 明 编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工具书。本书收集了499种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包括1949年以前的3种），并将发表于1950~2011年间的496种文献，按照每十年一个年代段进行分段。按照自然观、宗教观、社会观、符号与文字、艺术、总论六大类进行了概要介绍。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历史、人类学、民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概览：1950~2011 / 罗明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03-039845-1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考古—专题文献—中国—1950~2011
IV. ①X88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460号

责任编辑：雷 英 / 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何司阳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1/2

字数：270 000

定价：8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课题为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中华文明探源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

“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
精神文化的发展”（2010BAK67B06）

“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2013BAK08B09）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每位中华儿女的骄傲。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成为当今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Ⅲ阶段，设立第六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2010BAK67B06，简称“精神文化课题”），试图不仅从物质文明而且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完整过程，特别注重发掘中华精神文明的成就与特质，以及形成的过程与动因。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精神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也可视为国家社会中的先进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是由符号系统所构成的观念形态^①。因此，探索中华精神文明的起源首先要探索中华精神文化的成就，才能进而探索是哪些优秀的精神文化形成了中华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

由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主要集中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文明形成的初期即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也十分有限，所以不论是中华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化的研究，都必须以考古学方法为主。问题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缺乏一套完整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精神文化领域里以往的考古研究的实践工作与成果并非少数，但是均以个案研究为主，缺乏系统性，更难以从中直接建立理论框架。

于是探源工程第Ⅲ阶段“精神文化课题”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建立“精神文化考古综合研究理论框架”。而建立这套框架，必须梳理国内现有的关于精神文化考古的研究成果，厘清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大致分为哪些领域，这些领域基本上就是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最重要的领域。

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实质性的起步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收集了499种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其中只有3部著作早于1949年，兹介绍如下。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234页。



崔朝庆著《中国人之宇宙观》，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该书汇集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认识的相关文献，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对宇宙观的介绍集中在第一章“天地开辟论”和第二章“盖天、浑天、宣夜”。就“天地开辟论”，作者着重介绍了《淮南子》和张衡《灵宪》“清浊二气形成天地之说”，以及刘洪《乾象术》和徐整《三五历》“天包地如鸟卵”的浑天宇宙模型。作者提出，中国古代盖天说和浑天说由来已久，西汉末年已出现对立。东汉蔡邕时，新出现了宣夜说，没有渊源，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随后作者从星座、日月五星运行、冬至点、北斗及南中星、岁首及闰月、观测仪器、《周髀算经》的历法与数学、历朝历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与介绍。

唐兰著《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出版。该书是唐氏古文字学七书里的一种，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古文字的界定。作者认为隶书以前的文字为古文字，古文字分为四个系列：殷周系文字、两周系文字、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古文字的研究材料分为两种：一是古书，二是古器物，应当以古器物为主。作者介绍了古文字资料的积累情况，以及古文字学的研究简史。作者认为中国古文字起源于图形，由图形发展为“象意”字，汉字的起源距今至少3500年。上古文字的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由绘画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兴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声文字的兴起到完成是近古期。作者认为象形文字所象是实物的形，只要形似某物就达到了目的，至于采取什么方法来达到目的并不重要。象意文字包括传统所谓的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示字的大部分，这样只要把象单体物形的象形字和注有音符的形声字区别开来，余下的部分就都是象意。形声字是由象意、象语和象声演变而成的。第二部分是阐明研究古文字学的方法和规则。提出古文字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认为一个古文字学家应该具备文字学与古器物铭学的基本功。总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基本技术路线，如古文字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如何辨认古文字的形体，字形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字义的解释，字音的探索。作者专就图形文字提出如下研究方法：①由实物比较而得，②由简化的字比较而得，③和异族图形文字比较而得，④由分析偏旁而得，⑤由历史的追溯而得。作者还提出了研究古文字的戒律。最后提出古文字的应用问题。

高均著《论圭表测景》，1937年刊布于《中央研究院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专刊》。文章通过对河南登封告成观星台的实地调查，比较全面地探讨

了中国古代圭表测影技术的理论与实践，整理了汉代到唐代的影长数值，并一一进行了分析。

其余496篇文献均发表于1949年之后。1950~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走过了61年的历程，几乎每十年大致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变化的大阶段，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同样也遵循着这样的脉动，因此我们将1950~2011年国内（包括少部分在国外发表的）有关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的文献，按照每十年一个年代段进行分段，目的在于比较清晰地分析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实践的发展脉络和进步的步伐。

在每个年代段内，我们再根据文献研究主题的相近性归纳出自然观、宗教观、社会观、符号与文字、艺术、总论六大类，目的在于比较清晰地分析各阶段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内容的变化，反映出整个学术界对于精神文化考古研究理论认识的发展与深化、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建立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综合研究理论框架的认识前提和研究基础。

此外，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刊载的刊物十分分散，且许多刊物不易查找，由于许多文献没有电子版，这也使得研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的学者面临着不易检索已有成果、不易查询文献原文的困难。本工具书编辑的目的还在于为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的学者提供相关文献概要，提供比较准确的文献引导信息，以便他们查询原文、深究问题，将研究深入下去。

由于编纂者的学识与能力有限，收录的文献很可能没有穷尽所有已发表的相关成果，而且内容的摘编可能也限于理解的偏差会存在要旨甄别和表述的偏差，在此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谅解。

目 录

前言

1950 ~ 1959年	(1)
一、自然观.....	(1)
二、宗教观.....	(2)
三、符号与文字.....	(4)
四、艺术.....	(5)
1960 ~ 1969年	(7)
一、自然观.....	(7)
二、宗教观.....	(8)
三、符号与文字.....	(11)
1970 ~ 1979年	(12)
一、自然观.....	(12)
二、宗教观.....	(16)
三、符号与文字.....	(17)
1980 ~ 1989年	(22)
一、自然观.....	(22)
二、宗教观.....	(33)
三、符号与文字.....	(65)
四、艺术.....	(77)
1990 ~ 1999年	(79)
一、总论.....	(79)
二、自然观.....	(79)
三、宗教观.....	(82)



四、符号与文字·····	（ 103 ）
五、艺术·····	（ 107 ）
 2000～2011年 ·····	（ 110 ）
一、总论·····	（ 110 ）
二、自然观·····	（ 111 ）
三、宗教观·····	（ 128 ）
四、符号与文字·····	（ 166 ）
五、社会观·····	（ 174 ）
六、艺术·····	（ 188 ）
 著者姓名索引 ·····	（ 199 ）
后记 ·····	（ 206 ）

1950 ~ 1959年

一、自 然 观

1. 刘仙洲：《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天文学报》1956年4卷2期，219 ~ 233页。

文章利用史料介绍了中国在计时器方面发明创造的技术演变过程，证明我国在发明计时器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除最早的日晷和漏壶以外，早在1800多年以前东汉张衡就已开始采用齿轮系和凸轮等来发明创造显示时间的机械装置。到了唐代开元年间，僧一行和梁令瓚不仅采用了齿轮系和凸轮的技术，而且更进一步在同一中心线上或近似的同一中心线上，设置了两个以上运转速度不同的齿轮。北宋张思训和苏颂等的设计弄清了能控制原动运转速度的天衡的结构。这一系列发明为研究我国历代的机械型计时器提供了证据。元代郭守敬的设计，开始脱离天文仪器的范围，发挥了较多的凸轮作用，有了自动表示工作情况的装置。詹希元（约1360年）综合运用了齿轮系、凸轮和控制原动轮运转速度等种种技术手段，结构上接近后来的时钟，只是缺少在同一中心线上具有不同运转速度的分针。作者认为在7 ~ 14世纪之间，中国已有制造天文钟的悠久的传统，中国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嫡系祖先。

2. 席泽宗：《苏州石刻天文图》，《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25 ~ 27页。

文章介绍了发现于江苏省苏州市文庙里的石刻天文图，这是我国现今留存最古老、最准确的星图。此图是根据宋代元丰年间的观测结果绘制的，绘图者黄裳。图总高8、宽3.5尺，分两部分：上半部为绘有1440颗星的星图；下半部是说明文字。图下说明介绍了当时所知的一些天文知识，文章还介绍了全图所包含的天文学含义。全图以北极为中心，共有三个同心圆，另外还有一个中圆代表黄道，它和赤道斜交，形成 24° 的夹角。图上还有二十八条经线，分别等于二十八宿中各宿的赤道宿度。此图引起各国天



文学者的广泛重视，认为该石刻应是东方最古老的星图，在世界天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张彬：《关于我国古代计时器的历史资料》，《史学战线》1959年2期，48～52页。

文章按照时代的发展脉络，梳理了我国古代计时器的发展轨迹。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计时器是日晷和漏壶，东汉时张衡改造了浑天仪，北宋时苏颂制造了水运仪，元代郭守敬采用了凸轮，使计时器开始脱离天文仪器的范围。明代詹希元创造了完全脱离天文仪器的时钟机械结构，完全具备了现代时钟的一切特点。明末，自鸣钟开始传入我国。作者列举了55条“正史”以外的文献资料和现存的17处有关计时器的资料，并且着重介绍了明代以来完全脱离天文仪器、独立作为时钟机械的有关资料。

二、宗 教 观

4. 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11期，60～69页。

文章分三个章节就图腾崇拜和夏商图腾问题展开了论述。第一章“图腾与宗教起源略论”，主要列举了世界各民族和我国各民族有关图腾崇拜的事例来说明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作者认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初是无神观念的蒙昧低级阶段，随着人们对事物有了认知能力，产生了图腾制度和图腾崇拜。图腾崇拜再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只是到了父权制时期才注重祖先崇拜。至于百神定于一尊的上帝，早期卜辞称上天的主宰为帝，直到商代末期，在卜辞金文中才出现“上帝”这一名称，这就足以证明原始宗教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第二章和第三章就夏商的图腾作具体论证。有关夏代的图腾，文章以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作为旁证，又以见于典籍的商代先世图腾和卜辞金文相互印证，充分表明夏商图腾制度也是以动植物和无机物等为族群的来源。虽然夏商两代，图腾只是作为残余而存在，却足以证实古代地处中原的华夏部落也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经历过图腾崇拜这一历史阶段。

5.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131~159页。

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神话传说，接着根据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卜辞中的相关资料，考证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在文献传说中，古代东方的部族有太皞少皞，当即商族的始祖。这些神话般的人物，或出生的姓是凤，或本为玄鸟所生，或者在立国的时候，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在甲骨卜辞里，上甲的父亲高祖王亥的名字上加鸟旁，又称凤为帝使，鸟为祥鸟，高祖王亥和凤雌祥鸟，都受到隆重的祭祀。因此无论文献中的神话传说，还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字，都交验互证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

6.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帝王》，《历史研究》1959年9期，2~50页；1959年10期，89~110页。

文章利用商代甲骨文资料探讨了上帝和帝王称谓的来源和内涵，并结合古代文献资料，介绍了殷代的宗教信仰及其发展状况。由甲骨文证据来看，殷代从武丁时起就有了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这个至神上帝，主宰天地万物。由于帝的权力极大，所以帝又称帝宗，帝宗即典籍上所说的天宗。帝的下面有帝使、帝臣。帝使是帝所驱使的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等，它们来自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有专神主之，这五方主神则称为帝五臣或帝五工臣。

殷人认为帝是全能的，尊严至上，只有人王才有可能同他接近。商王朝的先王死后都能升天配帝。上帝称帝，人王死后也可以称帝。基于此，从武丁到帝乙，殷王对于其已故生父都称之为帝。为了区分上天之帝和人王之帝，从武丁以后，卜辞中在天上的帝上有时加一“上”字，称为上帝；从祖庚、祖甲以后，卜辞中在人王的帝上有时加一“王”字，称为王帝，以示分别。上帝又叫上子，王帝又叫下子，合起来简称上下或下上。

虽然殷人至上神上帝掌握着人间的雨水和年收，以及方国的侵犯和征伐，但如有所祷告，必须以先祖王帝为媒介，在帝的左右转请上帝，而不能直接向上帝进行祈求。这是上帝和王帝不同的地方。

其实这种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也见于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如《诗经·商颂·玄鸟》、《诗经·大雅·文王》、《尚书·盘庚》、《尚书·汤誓》、《墨子·非乐》屡次提到上帝的威能。

由此可见，天上统一至上神的产生，是人间统一帝王出现的反映。没有



人间统一集权的帝王，就绝不会有天上统一的至上神。殷代这一宗教信仰的社会意识形态，应该是同他的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由卜辞中这种至上神的宗教观来看，当时的宗教信仰已经开始为统治阶级服务了。殷代已不是氏族社会，它早已进入了阶级社会。

三、符号与文字

7. 孙常叙：《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位先生的“图画文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4期，1～37页。

作者肯定了图画文字的存在。认为语意图解的书写形式就是图画文字，它只为表现形成思想的语言思维，专门勾画它的主要概念和形象特点及其关系。图画文字可以通过画面上的事物形象及其关系，经过视觉唤醒读者头脑中与作者相同的语言思维，从而达到思想交流，因而是一种辅助语言交流工具。然而，图画文字不受语言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约束，没有系统的书写语言词汇以及语法系统，只是一些全民习用的概念图像和一些概念关系形象化的方法或符号而已，所以不是真正的汉字。与图画文字不同，图画则是一种艺术形式，虽然可以提炼为助忆符号，但还不是按照语言思维内容来做有组织的思维图解。

商周金文中图写事物形象而不成句的符号应是图画文字的残余，因受到成熟汉字体系的渗透已难再被视为图画文字的本体，但足以佐证象形的音节表意汉字系统成熟前曾经历过一个“图画文字时代”。图画文字的书写方法有象物、象事、象意三种，奠定了后来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写词因素的基础。

作者认为，图画文字的流行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对此辅助语言交际工具还没有提出迫切的改革需求——没有促使解决写话问题的社会力量和打算着手解决它的文字改革思想，总体说来，图画文字是氏族社会的产物。

作者在此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他认为汉字的形成是在形象写词法的基础上，加上假借和形声写词法的发明最终完成的。其中假借写词法是汉字发展质变的关键一步，只有假借方法的发明，才能突破图画文字的藩篱，按照语句结构从词写话。而且假借写词法这把钥匙，需要一定的社会力量才能扭开有史时代的大门。这股力量就是国家社会和商业发展，创造汉字体系的知

识分子是史官和卿士。

作者认为，汉字体系必定适合汉语体系，换句话说汉字是汉语言的表达符号。文章认为，铜器铭文中，真正的文字与图画文字残余共存，表明图画文字的消亡与表意文字的形成年代相去不远，这也就意味着汉字体系创成时代离商周不远，于是汉字体系创成的时代汉语同商与西周的语言基本相同。又根据商代甲骨文下起西周金文，上承于夏，所以夏商周三代语言是基本相同的，这一点往往被后学所忽视。虽然这一正确理论极难落实到考古资料上，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起源时，不可忽视汉字体系与汉语的理论关系。

在阐述了自己关于汉字形成的理论观点后，作者反驳以唐兰、梁东汉、高本汉先生为代表的“文字是由绘画而起”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把先期文字的名号强加在表意文字身上。他认为，在汉字科学上，没有书写原则和文字体系观念，只有单个的字形识辨和形体演变思想。不能只看到甲骨、金文乃至小篆在书写形式上的一脉相承，而忽视它们的书写原则；只看到图画文字中的新质因素而忽视了新旧质的本质差别和发展关系，这是文字学上的形式主义。

四、艺 术

8. 老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考古通讯》1956年6期，81~83页。

作者否认了西安出土的半坡人面形彩陶纹饰形象是人脸的图案的观点，认为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是图案化的水虫形象。文章推测半坡出土的平唇浅腹盆内壁的花纹也许就是对龙螭和鱼娘的形象的表现。这种精美的彩陶纹样，是当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某些生物的活动和性格已有深刻了解的具体表现。因此，半坡出土的平唇浅腹盆的形制和装饰纹样，很可能是后来殷周以至汉代鱼虫纹样青铜盘、洗的祖型。

9. 石兴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读后》，《考古通讯》1956年6期，83~84页。

文章从实物形态、认识的来源和治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表明了自己对老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一文的不同看法。首先，从观察实物形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半坡出土的平唇浅腹盆内壁的花纹更接近于人面。其次，从艺术源于生活的观点出发，认为原始时代的艺术品，往往是



人们生活的写照，甚或就是描绘生产者的形象。最后，从治学的态度入手，作者提醒学者们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严肃对待原始的科学资料。

10. 刘敦愿：《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考古通讯》1957年5期，95～96页。

文章对半坡人面形彩陶纹样的争论进行了分析，赞同石兴邦的观点，同意把半坡彩陶口沿内部和鱼纹并列的纹样解释为人面的形象，因为它具有明显的人面的关键特征，如圆形的轮廓、耳、鼻、口的器官形象，却恰恰看不出和水虫如龙螭等的相似之处，所以不同意老武的观点。为了便于学者们比较研究陶纹，作者建议把远古陶器花纹资料辑录出来。

11. 惠元：《偶谈船形壶和细颈瓶》，《考古》1959年6期，281页。

文章对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船形壶和细颈瓶进行了介绍。作者从器物的形态观察，认为船形壶叫菱形壶更为贴切。从造型上观察，此壶是系带子背于身上的水壶。细颈瓶是一种仿葫芦造型的器物，称为葫芦瓶似乎更妥帖。作者还介绍了二者的制法。作者认为这几件彩陶的出土，不仅丰富了仰韶文化的陶器种类，而且通过这种便携式水壶，有助于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1960 ~ 1969年

一、自然观

12.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2期，80 ~ 90页。

作者介绍了星象图的发现地点、布局、形成过程。1957年在河南洛阳市西北角城外的一座西汉墓壁画中，发现了这幅日、月、星象图，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星象图。图案由12块彩绘长方砖组成。文章推测最东的一幅是太阳图，随后是“中宫”的北斗及其有关的五车和贯索，再后是二十八宿中的九宿，包括东方的心、房宿，西方的毕、昴、参宿，北方的虚、危宿，南方的柳、鬼（或轸）宿等，并插入月亮图、河鼓（及其有关的旗星）和织女。文章指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很早就发现了四季的更迭，可以观测赤道附近的恒星的“中天”作为标准，也可以由初昏时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作为判断标准。后来受到了五行学说的影响，在四方之上又添“中宫”，从而成为“五宫”。而“四中星”也扩大到二十八宿，但仍分属“四宫”。这幅星象图便是在上述天文知识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此图为我国天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13. 孙常叙：《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考证》，《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5年1期，51 ~ 61页。

作者借用国外（西方）星座来步天，把天上星体、墓中星图和文献记载三方面联系起来，对每一幅星象的基本结构、形象特点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在星象图、星空、记载三方面一致的情况下，推定十一幅星象的西汉星座名目。文章认为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画的是“所以为司赏罚”的四守——紫宫、轩辕、咸池、两阿。星象图的特点是四守以紫宫为重点，紫宫以天极星为中心，系统地罗列了足以显示太一灵威的主要星象。根据该墓的年代及其顶脊星象图与《淮南子·天文训》的四守相吻合，所表现的星象及其之间的关系也与《史记·天宫书》记载相合。



14.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3期，27～38页。

文章指出，敦煌文书中星图上有1350多颗星，是现存世界上星数最多、最古老的星图。文章根据显微胶片拍摄的敦煌星图影像，介绍了卷图的画法，它将天球一分为二：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这种画法一直沿用到现在，略有不同的只是现在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一张圆图上。作者还介绍了星图上的星名、星数。据此文章认为敦煌星图体现了我国古代天文方面的重要成就。

15.庄天山：《中国古代流星雨记录》，《天文学报》1966年1期，37～58页。

文章收集了包括众多地方志在内的有关流星雨的记录，把所得资料编成了“中国古代流星雨记录表”。表中包括名称、编号、原文、资料来源、时间、相当于1900年春分点日期、辐射点位置、附注等。文章根据记录原文的特点划分为四类进行分析，确定了几个流星群的辐射点，对天琴座、狮子座、英仙座、仙女座等流星群进行了补充订正。

二、宗 教 观

16.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0年9期，253～268页。

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录中可以发现，中国远古时代的祭仪，最重要的可分为两种：一是与农业、渔猎整个有关且以村落之福祉为念的祭仪，统称为祭社；一是以村社内个别亲属集团的团结与福祉为念的祭仪，统称为祭祖。这两种祭仪不仅与部分神话传说有密切关系，而且以整个文化社会的环境为背景。该文章简单地讨论了这种仪式生活演变的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农业社会开始村落生活，我们有社祭的证据，而无系统化祭祖的证据。到了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祭祖的证据突然普遍出现。到了龙山时期及殷商时代，祭祖与祭社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且两种祭仪的主祭人或许是同一人。作者分析认为，这样的身份也许是由中国古代社会中主持祭祀人物的双重性所决定的，他们一方面是村落或王国的政治首领，另一方面也是某亲属集团的代表。因此，祖祭与社祭在龙山时期及殷商时代，也许是同一主祭，在同一地点或邻近处举行。然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群及祈求福祉的对象不同，而且由更早的仰韶期的资料所示，二者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